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 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朱 英 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 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朱 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 朱英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4-9

I. 辛… II. ①朱… III. ①经济政策—研究—中国—清代②经济改革—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07 号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作者:朱 英 ©

责任编辑:段 维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98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5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序 言

章开沅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由状元“下海”成为企业家的张謇，到日本参观访问以后就深深感到政府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之极端重要。他有一段名言：“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张謇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通过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参照，明确提出政、学、业三者之间需要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这在当时确实称得上真知灼见。

在政、学、业三者之间，张謇显然更强调政，而批评最多者亦在于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任何国家，政府及其政策在国内总是起主导作用；而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奋起与强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势力相竞争，就更加需要政府对企业的政策倾斜与实力扶持。张謇在访日期间，非常羡慕日本政府奖励补助（包括资金支持）工、商诸业的政策，他称之为“以予为取”，有远见的投入必将产生极大的效益。他感叹说：“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路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而要想在这场文明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去向”。

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仍属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范畴，社会转型虽已开始然而步伐极为缓慢。步伐缓慢的原因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知识不足。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早于

日本十多年，但中国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知识结构的变化，却远远落后于明治维新政府的上层人物。所以，尽管在趋新的士大夫和部分官员推动下，经济方针由“求强”逐步倾斜于“求富”，而且工、矿、交通各业都略有建树，但从总体而言，作为“君相之事”的“政”仍然拖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一书的作者，正是有感于政府政策导向与配套措施的重要，以及以往史学界对于这一领域探索之不足，才经过多年刻苦研究并撰写付梓的。

本书力图矫正过去对清朝后期的政府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弊病，力求历史主义地客观陈述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演变过程。作者把辛亥革命前期这一时间概念界定为甲午战后，因为清朝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广度、深度与力度，确实是在1895年以后才有清晰的轨迹可寻。过去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和庚子之役的极端愚昧落后，殊不知这两件大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留下深刻的印痕。如果说前者至少是通过一系列诏谕，初步勾画了虽然简略却也清楚的现代国家的草图；后者则是以历史的反动及其空前加深的民族灾难，为清朝政府的顽固传统路线谱写了一曲悲惨的挽歌。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使清政府的整体趋新政策导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辛丑以后的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它缺乏足够的自觉。

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也有爱谈因果关系的习惯，譬如上述“政因而业果”，士大夫（即学）需要“通因果为权”之类。我们史学界的祖师爷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对历史学家提出极高的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通因果为权”的典范。但是在我国晚清史的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寻求往往失之于公式化、简单化，因而有时难免忽略了因果关系内涵与外延的错综复杂特点。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十年新政的研究与论析，人们常常是因为清朝最终的覆亡，而否定了它在某个时期和某种程度上多少顺应潮流的转变与努力。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处在这个大潮流中的人群（包括统治者）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其中总有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做某些适应社会转型的事业，充其量无非是存在着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奋力推进与勉强因应之类的差别而已。

我很同意作者的说法：“无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这种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及其改革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不仅从总体上论述了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而且还从财政、金融、农业、贸易、矿务、铁路各方面，对政府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作了更为具体的陈述与阐释。作者的视野又不仅限于经济政策的本身，他还认真考察与评述了与经济政策变化密切相关的政府机构、立法运作、劝业措施乃至涉及面更宽的地方自治与市民社会等等问题，使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获致对晚清社会经济变化更为全面与深入的理解。当然，作者的态度是客观与公正的，既恰如其分地肯定了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某些积极因素，同时又进而评说其得失，探寻其因果关系与经验教训。他不像时下有些轻浮作者，忽然一反过去对清朝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全盘否定，转而对它们的许多政策措施给以缺乏研究基础的溢美乃至颂扬。我一贯提倡“治学不为媚时语”，这不是回归传统士大夫的自我矜持，而是现今具有科学头脑的历史学家追求真理的应有良知。

就近代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而意义重大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性质不同，基础不同，终极目标与环境机遇也不相同。但是，作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且正确地制订政策、健全立法并采取各项相应配套措施，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若干有益的东西。因此，或许可以认为，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我相信，不仅是历史学界的同行与学生，即使是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和工商界的主管人员，也将有兴趣阅读此类书籍。读史可以益智，不管时下有多少人以为这是迂腐，我却永远对此深信不疑。

1994年冬于桂子山寓所

前 言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行文中常简称为“晚清”或“清末”）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是一个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对时下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具有参考借鉴意义的研究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未予以充分重视，有关的成果非常少见。同时，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一些著作在提及清末“新政”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加以全盘否定。对“预备立宪”也简单地斥之为伪立宪，认为毫无积极意义可言。自80年代开始，随着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学术界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并且对过去缺乏研究的许多课题，也着力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清末“新政”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并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特别是对“预备立宪”的讨论十分热烈，已涉及许多细节问题。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的成果也时有问世，并出版了诸如侯宜杰所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等有一定分量的专著。有关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研究，同样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也陆续发表了一部分论文，但仍显得比较薄弱，迄今为止尚无有关专著出版。国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虽然较早即给予关注，但也只有—些论文发表，未出版专著。因此，对这一课题仍有全面深入探讨的必要。目前的研究尚限于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某个方面的经济政策加以考察，缺乏系统分析和应有的深度，有些方面的政策也仍然忽略未论，有些观点则仍值得商榷。

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清朝的商会，即查阅到一部分有关那一时期清政府经济政策的资料。当时通过查

阅有限的资料，即初步感觉到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对清末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评价，似乎与史实不无出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接触更多的有关史料，这一想法愈益明显。于是，开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并利用外出的机会进一步收集有关的各方面资料，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奠定基础。

另外，笔者在近十余年研究晚清历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以往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清政府，似乎也存在着简单和片面评价的情况，只看到这一时期清政府衰朽反动的一面，忽视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新变化。平心而论，这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乃至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无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实际上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这种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与改革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一大缺陷。在对当时的清政府作出定性的评论时，一些论著常常借用当年革命党人的话语，诸如“洋人的朝廷”等，将清政府说得一无是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出于革命宣传及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对清政府进行猛烈的抨击，以各种方式和言词尽量揭露其腐朽反动的一面，是情有可原也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却不宜简单地借用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话语对清政府做出定评，而应进行全面的考察，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这样才能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否则将难免失之片面。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作出些微努力以弥补这一缺陷。起初并未曾大胆地设想撰写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只是尝试通过研究其中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而其他人士未曾注意的问题，从某个侧面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清政府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同时，限于时间和个人的学识，也不可能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各个方面的政策及其改革措施，均一并加以探讨，只能结合自己过去的研究基础和已掌握的有关资料，扩大视野，拓宽领域，着重对晚清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作专题性的研究。即使是这个研究计划最初也很粗略，至多不过是自己大脑中的设想。然而，一旦投入到这个课题的研究之

后，越来越感到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也增强了笔者的信心。几年来，陆续撰写了一些与本课题有关的论文，其中有数篇分别在《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史学界同仁的热情鼓励。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书，由于上述原因，在体例上不能说非常严密。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本书的特点仍然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分别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之所以仍然采取这种形式，一是可使研究更为深入，对某个方面的问题尽可能作更详细的分析；二是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已有学者发表论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本书如果面面俱到，难免重复他人的论述，徒增篇幅而无学术价值。所以，有些虽然重要但已有论文发表的问题，本书没有以专章进行探讨。而有些问题尽管以往已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本人的观点与他人不同，则仍以专章加以阐明，如对清末新政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的考察等。另外，有些方面的问题本书虽辟专章进行了讨论，也并非对这方面的所有细节都以相应的篇幅展开论述，仍主要是选取以往研究较薄弱的内容作为重点，例如财政金融政策及有关措施方面的甲午“息借商款”和发行“昭信股票”等，而对赋税政策、币制改革等则未予论述。

笔者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专题探讨虽已有数年，但此次成书的时间却十分仓促，来不及对内容及体例作细致的补充与调整。如果说专题研究的方式也有缺陷，那就是某些内容在论述过程中容易交叉重复。笔者在整理过程中虽力图删去交叉重复的内容，但因时间关系恐难免仍留下这方面的缺陷，敬请读者见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1)
一、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	(1)
二、甲午战后清政府发展实业的主要措施	(6)
三、甲午战后清政府发展实业政策的积极影响及局限	(13)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	(20)
一、甲午“息借商款”	(20)
二、“昭信股票”的发行	(25)
三、解决财政困难的其他措施	(34)
四、近代银行的设立	(37)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农业政策	(45)
一、发展农业的新认识	(45)
二、戊戌变法时期的发展农业政策	(48)
三、清末的发展农业政策	(51)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贸易政策	(61)
一、清初的贸易政策	(61)
二、晚清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67)

三、晚清对外贸易的双重影响	(75)
第五章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矿务政策	(85)
一、甲午战前的矿务政策	(85)
二、甲午战后的矿务政策	(100)
第六章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铁路政策	(119)
一、甲午战后的铁路政策	(119)
二、路矿总局时期的铁路政策	(124)
三、商部时期的铁路政策	(128)
四、邮传部时期的铁路政策	(133)
第七章 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发展实业措施之一	(139)
一、商务局、农工商局的设立	(139)
二、商务局、农工商局的职责	(144)
三、商务局、农工商局的实际作用	(151)
四、商务局、农工商局的局限	(159)
第八章 创办劝业会：发展实业措施之二	(162)
一、端方与南洋劝业会	(162)
二、清末的武汉劝业奖进会	(167)
第九章 颁行经济法规：发展实业措施之三	(173)
一、晚清经济法规的产生	(173)
二、晚清经济法规的种类	(178)
三、晚清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	(184)
四、晚清经济法规的局限	(191)
第十章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	(198)
一、晚清地方自治政策的推行	(198)
二、晚清地方自治政策的主要内容	(202)